

青年毛澤東的 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

劉季倫 · 著

本書榮獲

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
研究中心
補助出版



政大出版社
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

青年毛澤東的 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

劉季倫 · 著



本書經國立政治大學出版委員會
人文學門之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

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／劉季倫著．－初版－

臺北市：政大出版社，2012. 01

面：公分

ISBN 978-986-6475-17-7 (平裝)

1. 毛澤東 2. 學術思想 3. 共產主義 4. 中國

549.4211

100028177

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

著 者 | 劉季倫

發行人 吳思華

發行所 國立政治大學

出版者 政大出版社

執行編輯 吳儀君

地 址 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

電 話 886-2-29393091#80626

傳 真 886-2-29387546

網 址 <http://nccupress.nccu.edu.tw>

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

地 址 10047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18號5樓

網 址 <http://www.angle.com.tw>

電 話 886-2-23756688

傳 真 886-2-23318496

郵撥帳號 19246890

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

電 話 886-2-23913808

排 版 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製 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 2012年1月

定 價 250元

I S B N 9789866475177

G P N 1010100076

政府出版品展售處

-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：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886-2-25180207
-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：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
電話：886-4-22260330

尊重著作權・請合法使用

本書採用環保油墨印刷，封面選用環保美術紙

獻給我的母親陸白烈女士（1931-2006）

序

毛澤東作為一個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人，如何不自覺地受到各種既定條件的制約，又如何靈活地運用這些既存的條件，我們可以從他一生的革命事業中，去分析與探求。這是一個更為繁重的研究工作。不是我所能解決的。

然而，先去分析毛澤東這個人物，作為一個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個人，如何在精神上、思維上，做好準備，而這種準備，又如何影響到他以後的事業，這卻是相對較為容易的工作。

這本小書要探討的，就是青年毛澤東，在成為這樣一位統一中國的人物之前，在思維上、在精神上，做過什麼樣的準備；而這些準備，又在哪些程度上，影響並決定了毛澤東後來的革命事業。

我完全不希望：這本小書會把波瀾壯闊的中國共產革命，限縮成毛澤東一己的片面行動。這決不是我的意圖。事實上，毛澤東所從事的革命，如果不具備相當程度的普遍意義，那就決不可能成功。這應該是無庸贅言的。¹

在對於中國共產革命的研究上，這本小書，不應該、也不可能排

¹ 毛澤東的遺產，各式各樣。決不能簡單地否定他。這在生長於冷戰、內戰結構形成的意識形態中的我們而言，尤其必須警惕。在經濟上，有郭益耀：《不可忘記毛澤東：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》（提醒我們「不可忘記毛澤東」）。在政治上，他的正面影響也決不能忽略。請參看陳宜中：〈永遠的反對派：袁庚華先生訪談錄〉，刊載於《思想》，18期（台北：聯經，2011年6月），頁39-79。

擠其他從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方面，所從事的研究。我只是想要從毛澤東自己的角度，來看待這場革命，對他而言，具有什麼樣的意義，如此而已。

羅蒂（Richard Rorty, 1931-2007）有這樣的想法：思想史可以被作是一種隱喻史（“intellectual history viewed as the history of metaphor”）。為什麼是隱喻？舉個隱喻的典型例子：「城市是一個叢林。」城市並不只是「像」叢林，它就「是」叢林。我們研究的思想者，在理解這個世界時，並不說這個世界「像」什麼，而是說：這個世界就「是」什麼。並沒有什麼客觀中立的「歷史真實」（historical Reality），但思想者相信「歷史真實」就是他所認定的那個樣子。與其說這是一種發現，還不如說這是一種發明。²

所以 Mary Hesse 認為「科學革命」，就是對自然加以「隱喻式的重新描述」（“metaphoric redescriptions”），而不是對自然本性的洞視。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, 384BC-322BC）的想法、伽利略（Galileo, 1564-1642）的想法，牛頓（Issac Newton, 1642-1727）的想法，乃至於愛因斯坦（Albert Einstein, 1879-1955）的想法，並不像實證主義者所以為的，後出者轉精，愛因斯坦的一套語詞，較亞里斯多德的更能恰如其份地符合這個世界的物理；而是說，愛因斯坦發展出來的語詞，恰巧比先前的任何工具，更適合於若干特定的目的。³

² 請參看 Richard Rorty, *Contingency, Irony and Solidarity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9), p. 16。此處的中譯，來自於徐文瑞的譯本。見 Richard Rorty 著，徐文瑞譯：《偶然、反諷與團結》（台北：麥田，1998），頁 53-54。

³ Richard Rorty, *Contingency, Irony and Solidarity*, p. 19，以及 Richard Rorty 著，徐文瑞譯：《偶然、反諷與團結》，頁 58。

我要說的是：毛澤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、對中國傳統政治的理解，都只是一種「隱喻」(Metaphor)，或借用 Mary Hesse 的話來說，是對他所身處的世界，所做的「隱喻式的重新描述」。

毛澤東是如何看待他身處的世界？這是毛澤東針對他身處的世界所做的「隱喻」。正是毛澤東基於這些「隱喻」，所發展出來的對未來的「隱喻」，才產生了變革當時中國的歷史力量。

當然，說到最後，各種思想史的撰寫，也是一種隱喻史。對於前人思想的研究、解釋與推陳出新，事實上就是隱喻出現並推陳出新的過程。思想史本身，也只是對已逝去人物之思想，作「隱喻式的重新描述」。所謂歷史真實(historical reality)，並不能自己說話，說話的，是觀注這些歷史事件的史家。歷史真實，是我們注視過去，並試圖解釋過去時所產生的東西。⁴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歷史真實。

正如人類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描述地球的投影法一般，某一投影法，也許對於地球的某一地帶，能做較好的描述；但在其他地帶，就反而可能造成失真的副作用（舉例來說，麥卡托投影法 [Mercator Projection]，在描述赤道一帶時，就較為準確；但在南、北極一帶，就不免失真了）；學者的研究也是一樣，某一種研究取徑，或許能夠從某一角度，來突顯某一研究課題的性質，但在其他方面，就不免失真了。解決之道，不見得是完全放棄這種研究法，而是以其他的研究法來補充它、修正它。人類大約不太可能發展出一整套無所不包的普遍理論，也不太可能發展出一套永遠正確、面面俱到的研究方法；而只能發展出一叢叢的求知方法與知識系統，它們各有所長，也各有所短。學者對於自己的研究取徑，在那些方面上必然存在著限制，必須

⁴ 韓格理 (Gary Hamilton)：〈天高皇帝遠：中國的國家結構及其合法性〉，收入氏著，張維安等譯：《中國社會與經濟》(台北：聯經，1990)，頁 105。

有足夠的自覺。⁵

我希望我的讀者，能夠以這樣的方式，來看待我這篇小小的研究報告。

在這裡，我想要向我的兩位匿名評論人致謝。我不知道他們是誰，但他們的學力與風格都讓我敬佩。他們費了極大的心力，耐心看完這部論文，並在評論中，向我展示了另外一些可能的角度，指出我推證上的漏洞與缺失，讓我能稍稍跳出由於始終關注此一議題，因而產生的察秋毫卻不能見輿薪的困境。因為他們的指正，我對論文做了大規模的修改；有些章節（第四章），甚至乾脆重寫。並且又再加寫了第六章。於是份量與篇幅都增加了不少。他們的認真與真誠，是學術與學術社團得以茁壯的原因。這部小書，如果能減少一些顯而易見的毛病，他們功不可沒。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，也覺得不能向他們當面致謝，真是一大遺憾。但他們立下的榜樣，必定留在我們的學術社群中，成為無形的資產。

我想要特別感謝孫鐵剛老師，不是他一路關心，這本書不會完成。唐啟華兄、劉維開兄，還有政大出版社的吳儀君小姐，也一直在出版事宜上盡力幫助我。謝謝你們。

能完成這本小書，還要感謝內人韻璧的支持。在漫漫人生崎嶇艱難的道路上，妳陪我一起走過。不是妳，就算我能撐得住，也要寂寞辛苦得多，謝謝妳。

最後，我想將這本小書，獻給我逝去的母親陸白烈女士。她一生坎坷，在私人生活上，辛酸備嘗、痛苦不堪。但她從來沒有變成一個

⁵ 參看史蒂芬·霍金（Stephen Hawking）著，郭兆林、周念榮譯：《大設計》（*The Grand Design*）（台北：大塊文化，2011），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。見頁8。

徹底犬儒、虛無的人；在艱辛的環境裡，她仍然覺得家國天下與她自己息息相關。她相信人在有生之年，對這個世界，應該盡到一己之責：為歷史減輕一些共業，為後世增進一點幸福。

對我而言，她是我的典範。我但願我更像她一些就好了。

劉季倫

2011 年 10 月於新店

CONTENTS

序	i
前言	001
1 毛澤東思想中自然與人的連續性	003
2 「大我」的擴張與完成	033
3 「矛盾」與「實踐」：共產革命的規律與方法	085
4 大我的客觀化與非人格化	129
5 不斷革命	171
6 結論——回顧中國共產革命	185
徵引[文獻]	205

前言

余英時曾經把毛澤東（1893-1976）的一生分成三個段落：「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，這是毛澤東決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醞釀階段」。「從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個段落；這是他的革命時代，從湖南地區的黨的組織者逐步取得了全黨領袖的地位」。「1949年以後是他一個人獨霸中國大陸的時期」。¹ 他的思想，大致也相應著余氏的分期而發展。本章就以毛在第一期與第二期前半段的思想發展，作為討論的範圍。

從毛澤東的青年時代開始，便致力於哲學；而且終其一生，不改此風；如李澤厚所說的：「哲學，確乎是毛澤東從早歲到晚年一直非常感興趣和非常關注的方面」。² 我們在他那些關於「哲學」的文字裡所看到的，是一套自成體系的「哲學」，一套由「剛性的」與「柔性的」兩種人格特質交揉而成的兩面體。詹姆士（William James, 1842-1910）曾指出：「哲學史在極大程度上是人類幾種氣質衝突的歷史」；「那些確實傑出的人，有重要特性的人，他們在哲學上留下了他

1 余英時：〈打天下的光棍〉，收入余英時：《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95），頁45。

2 見李澤厚：〈青年毛澤東〉，收入李澤厚：《中國現代思想史論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123。毛澤東的研究者蕭延中也指出：「毛澤東一生酷愛哲學，對它表現出始終如一的濃厚興趣，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。」見蕭延中：《巨人的誕生——「毛澤東現象」的意識起源及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發展》（北京：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，1988），頁61。

們的特徵和形象的烙印，並在哲學史上占有地位」。他以為基本上可以把人類的氣質分作兩種：「柔性的」(the tender-minded, 「唯心主義的」、「樂觀主義的」、「意志自由論的」、「一元論的」、「武斷論的」)與「剛性的」(the tough-minded, 「唯物主義的」、「悲觀主義的」、「宿命論的」、「多元論的」、「懷疑論的」)。³ 對於毛澤東而言，James 的說法有其一定的道理：毛的「哲學」，是毛的人格의 投射；但由於毛的複雜，所以在他身上不但有 James 所謂的「柔性的」人格，也有他所謂的「剛性的」人格。這兩者交織而成了毛獨特的哲學。正是這樣的人格，使得他得以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領袖，進而使得整個中國共產革命浸透了他的人格的色彩。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，去理解他的「哲學」，以及這樣的「哲學」的兩面性，以及其所可能派生出來的行動的力量與模式，才變成一個關鍵的問題。B. Schwartz 曾問過：「如果毛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我們還會這樣對待他的思想嗎」？他老實招認：「很顯然我們是不會的」。⁴ 我們正是為了理解毛的「哲學」的應用，才關注他的「哲學」的內容；正是為了明白他的「哲學」的庸俗化的意義，才必須釐清他的「哲學」的本身。

³ William James 著，陳羽綸、孫瑞禾譯：《實用主義》(Pragmatism: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)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4)，頁 7、9-10。

⁴ Benjamin Schwartz 著：〈毛澤東思想的形成〉，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室編譯處編：《西方學者論毛澤東思想》(北京：中共黨史出版社，1993)，頁 192。

第一章

毛澤東思想中自然與人的連續性

毛澤東自己曾經借用湖南的一句俗諺：「草鞋無樣，邊打邊像」來描寫他的想法與做法，在現實中逐漸成形的經過。¹ B. Schwartz 也以為：「毛澤東主義的特徵，不在於它的理論的領域，而在於它的策略的領域」。² 日本的學者新島淳良更指出：「他（毛澤東）的作品就是中國革命」。³ 所以，可以說毛的思想，在從第一期（醞釀階段）發展到第二期（革命階段）時，經歷過劇烈的震蕩。要理解毛澤東的思想，越到後來，就越不能離開共產革命中現實的、具體的因素所產生的影響。但細加推究，仍可以在毛氏第一期的文字中，看到後來發展的痕跡。

依據毛澤東自己的回憶，到了 1920 年夏天，「我在理論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動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，從這時起，我就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」。就在這一年，他從余英時所謂的醞釀階段轉入了革命階段。

¹ 轉引自 John Bryan Starr, *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: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79), p. ix。中文的還原，我取自由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」翻譯的此書的中文譯本《毛澤東的政治哲學》（北京：中央文獻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 1。

² Benjamin Schwartz, *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* (New York: Harper Torchbooks, 1967), p. 189.

³ 新島淳良：〈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〉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：《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》（北京：中央文獻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 34。

毛澤東在接受斯諾（Edgar Snow, 1905-1972）訪問時曾夫子自道，在 1920 年這關鍵的一年以前，由於受到了他的老師（後來是岳父）楊昌濟（1871-1920）這位「唯心主義者」的影響，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「唯心主義者」。所以，依據他自己的意見，1920 年的「改宗」，可以說是從「唯心主義」到「唯物主義」的「改宗」；從此以後，毛澤東才展開他與中國共產革命相聯繫的一生。⁴

然而，思想的肇端，不可能毫無根據；思想的發展，也不可能無風起浪；在毛澤東的第一期與第二期之間，更不可能斷為兩截，前後渺不相關。我在這一節想做的，就是說明毛澤東的轉變是怎麼完成的，具有甚麼樣的意義。

我所根據的史料，主要是青年毛澤東在蔡元培翻譯、德國的泡爾生（Friedrich Paulsen, 1846-1908）著作的《倫理學原理》⁵一書上的批註。1917 至 1918 年間，毛澤東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時，於楊昌濟的「修身」課程上，開始閱讀這本書，並在上面寫下了大量的批語。這些批語，大體顯現了他的第一期思想的面貌。⁶但也由於這些文字不是有系統的著作，而只是零碎的批語，所以它們的意義，有待仔細

4 埃德加·斯諾（Edgar Snow）著，董樂山譯：《西行漫記·紅星照耀中國》（*Red Star Over China*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），頁 121-122、127。

5 此書的原名應為 *System de Ethik*，德文版於 1889 年出版，英文版於 1899 年出版。

6 李銳（1917-）大約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中，第一位得睹此書批語的人。此書先是由毛澤東借給了湖南一師的同學楊韶華；隔了許久，直到 1950 年，楊才托周世釗（1897-1976）還給了毛澤東。周世釗知道李銳「很關心毛早年讀書生活和活動情況」，所以把這本書交由李銳翻閱了三天。李銳當即把所有註有批語的部分拍照保存下來。見李銳：《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 204，以及毛澤東：《〈倫理學原理〉批注》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（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 276，註 1。台灣的河洛出版社曾經把這本書影印出版，所根據的正是當年毛澤東讀過的同一版本——當然，上面不會有毛的批語；見泡爾生著，蔡元培譯：《倫理學原理》（台北：河洛，1974）頁 117，及毛澤東：《〈倫理學原理〉批注》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，頁 116 的書影。

的比對與分析。Frederic Wakeman, Jr. (1937-2006) 曾指出：這本書對於毛澤東的「唯意志論」(voluntarism) 具有啟發之功。⁷ 不過，我們的目的，並不在辨別毛澤東從泡爾生得到了甚麼，而就只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本身。

毛澤東所面臨的時代，借用德國的泡爾生的說法，是一個「開放時代」：「當今之時，無論其為思想、為道德、為生活之法式，一切捨舊而謀新。至於宗教之權，與夫古昔之傳說，人人視為弁髦。此由受太過之壓制，忽反動而為懷疑派，其主觀之思想，遂潰裂而四出。實往昔學而不思之學派，及有信仰而無詰難之教會，所激而成之，是為開放時代之特徵」。毛澤東讀到這段話以後，以為這正是「吾國今時之現象」，「吾國二千年來之學者，皆可謂之學而不思」。⁸ 換言之，在他看來，正由於中國「二千年來之學者」「學而不思」，所以激成了五四時期這個「思想」、「道德」、「生活之法式」全都「捨舊而謀新」，「主觀之思想」「潰裂而四出」的時代。

借用泡爾生的說法，「國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縮之時，若思維行為一定之習慣，若歷史沿襲之思想，若構造，若權利，與時俱增」。毛澤東相信「中華民國正處此地位」，一切都「老衰萎縮」了；於是，「傳說足以阻革新之氣，而過去足以壓制現在，對待新時代之能力，積漸銷磨」。長此以往，「此歷史界之有機體，卒不免於殄滅」。⁹

在這樣的時代裡，青年毛澤東開始了他的思想醞釀的第一階段。

⁷ Frederic Wakeman, Jr., *History and Will: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-tung's Thought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5), pp. 201-202.

⁸ 泡爾生的話，見泡爾生著，蔡元培譯：《倫理學原理》，頁21。毛的批語，見毛澤東：《〈倫理學原理〉批注》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，頁134。毛讀到此處時，覺得切合於中國當時的狀況，所以在天頭上寫下了上引的批註。

⁹ 毛澤東：《〈倫理學原理〉批注》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，頁199。

他上下求索，意圖尋求「大本大源」；而所謂「大本大源」，就是「宇宙之真理」。由此可見，毛從一開始，就希望能為他所面臨的特殊時空中的特定問題，尋得普遍的、根本的解答。

他以為：當日中國所謂「變法」，「俱從枝節入手」，如「議會、憲法、總統、內閣、軍事、實業、教育」等等，「一切皆枝節也」。儘管這些「枝節」亦不可少；但更關鍵的，卻是這些「枝節」的「本源」，「此等枝節，必有本源」。如果「本源未得」，則「此等枝節為贅疣，為不貫氣，為支離滅裂」。不去尋求「本源」，卻總在「枝節」上射覆忖度，即有偶合，也只是偶合而已：「幸則與本源略近，不幸則背道而馳」。取這種與「本源」背道而馳的「枝節」以治國，必定致於禍國、亡國：「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，幾何不謬種流傳，陷一世一國於敗亡哉？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可言哉」？

那麼，這「大本大源」是甚麼呢？他以為：「夫本源者，宇宙之真理」。「宇宙之真理」是人人具足、不假外求的；原因是：「天下之生民，各為宇宙之一體；即宇宙之真理，各具於人人之心中。雖有偏全之不同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」。而所謂「偏全之不同」，則形成了賢愚之別：「聖人，既得大本者也；賢人，略得大本者也；愚人，不得大本者也」。

既然「大本大源」就深植於「人人之心中」，藉此以號召天下，就等於是直指人人的本心，必能造成一呼百應的效果：「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，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」？這由人人動員起來而形成的集體的力量，無一事不可為，正是富家強國、乃至於改造世界之道：「天下之心皆動，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？天下之事可為，國家有不

富強幸福者乎」？¹⁰

在別的場合，毛澤東也曾經借用西方哲學中的用語，以闡明「大本大源」的真義。他以為「宇宙」分做「本體」與「發顯」（今譯為「現象」）兩個部分。¹¹而人類所分享的宇宙的「大本大源」——「宇宙之真理」，就來自於這個「本體」：「人類者與本體有直接關係，而為其一部分；人類之意識，亦即與本體之意識相貫通」。所謂「本體」，如果借用宗教的語言來為之命名的話，「或名之為神」；就此而言，人人都秉有相當的「神」性。¹²毛澤東也借用了中國傳統的用語，以為：「人心即天命，故曰天視自我民視。天命何？理也」。¹³

然而，儘管他借用了中國傳統的語彙，這些語彙所承載的意義，卻已經與原義不大相同、甚至大不相同了。毛澤東是在他自己的一套符號系統中，來重新運用這些詞彙的。語彙依然，但它們的位置、它們的作用、它們的意涵，都必須重新加以考釋。

在中國的傳統中，「天命」、「天道」是一個「道德秩序」（moral order）。「天命、天道貫注到個體的身上」，「天命下貫而為『性』」；於是「天生的人類」（「一切人」），便都具備有「常性」，或稱「好善惡惡的德性」。¹⁴我們不妨稱這種形態的人性論為「道德人性論」。由於人人生而秉有這種源自於天的「天性」；所以，可以說：在中國傳統的宇宙觀中，人與天之間存在著一種「存有的連續性」（the

¹⁰ 毛澤東：〈致黎錦熙信·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〉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，頁85-87。

¹¹ 毛澤東的這段文字，是他在閱讀泡爾生的《倫理學原理》（蔡元培的中譯本）時所記的批語；所以，這些用語，事實上轉手於泡爾生此書的中譯本。

¹² 毛澤東：〈《倫理學原理》批注〉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，頁229-230。

¹³ 見毛澤東：〈講堂錄〉，《毛澤東早期文稿》，頁588。〈講堂錄〉是毛在湖南第一師範上楊昌濟的「修身」課與袁仲謙（1868-1932）的「國文」課時記下的筆記；見李銳：《早年毛澤東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57。

¹⁴ 牟宗三：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（台北：臺灣學生，1978），頁16-17、20-23。